

关于国防文字论战

〔日本〕丸山升

甘肃师大

训练部科学研究所
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

翻印

关于“国防文学论战”

——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之二

〔日本〕 丸山升

本篇是想继前一篇之后^{*}，对“国防文学论战”本身进行探讨。我曾说过，把前一篇作为“第一篇论文”，“第二篇论文”准备分析一下“国防文学论战”和周扬等人对这一问题的“歪曲”^①。本篇就是所说的“第二篇论文”。它刊于《东洋文化》第五二期时，由于篇幅限制和准备不足两个原因，没有登完就中断了，现在把它补足写完。

关于“国防文学论战”，已经有好多人写过论文或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先申明一下，我的这篇论文从前人的文章中得益不少，而且在内容方面也会有不少与它们重复的地方。然而，我虽然预想到会有这样的重复，但仍然想再一次谈谈这次争论，原因正象前面所讲的那样，除了它是整个主题中不可缺少的命题之外，还由于想从处理这个问

【附注】^{*}即《丸山升一九三五、三六年的“王明路线”——
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之一》，收入丸山
升《日本现代文学的理论与思想》一书。

题的角度来发表我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这个争论占正统地位的看法是认为，这是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周扬等人，与站在“毛泽东路线”一边的鲁迅等人的对立。我在前一篇论文中，对这一点已经提出了疑问。我的疑问最根本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对所谓“路线”的看法。根据我的看法，所谓“路线”，应该说它是某个个人或集团对现实的认识乃至建立在这种认识上的理论，它具有特定的倾向，并且与方针政策的选择和决定结合在一起，成为系统的东西。不言而喻，它不是仅仅对各个个别问题的某种见解，而且还应该与个人或集团的思想观点所具有的一贯性特征相区别开来。当然，路线是不能离开后者而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路线正是后者所产生出来的。尽管如此，路线并不是从后者直线地产生出来的，也不是它们简单的总和。后者要形成路线，就要由某个集团或组织作为一致的意见而得到确认，这个集团或组织的方针、政策都要以它为准则来选择和决定②。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国防文学论战”，那么，大家知道，包括上海在内，当时所处的情况是这样：“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结果几乎全部被破坏，由‘左’倾分子所组织的临时中央也于一九三二年不得不转入了中央红军根据地”（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党中央离开上海之后，一般认为，以周扬等人为中心的留在上海的一些党员文学家，他们是否拥有与中央保持着组织联系的方法，虽然不得而知，然而，特别自长征开始后，可以说与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在那样的情况下，即使周扬等人

主观上认为是留在上海的真正唯一的党组织，代表党在自觉地行动，但实质上应该说他们是个人组成的集团，在那里发挥重大作用的，与其说是整个党的方针、政策或路线，不如说是他们通过自身的经验所掌握的理论 and 思想，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个性和感情也是起了很大作用。观察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展开的这种论争，一般认为，需要的不是匆忙地把它与党的“路线”联系起来，判定它们的“正统”性或“异端”性，而是来讨论在那种情况下，想法与行动各不相同的各个个人和各个集团，在其内部支持他们的，使他们行动起来的思想、理论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争执，以及他们的性格和思想表达的本质差异。

在重新清理这次争论的焦点的同时，我想就参加这次争论的一些主要人物，用上述观点重新评价。这就是我写这篇论文的目的。

原注：

①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周扬他们的一条“罪状”被指出来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有关文章中，周扬他们加上了“注释”，说这些论文是冯雪峰起草的，给人的印象是未必出于鲁迅的原意；还有《全集》所收的“书简”，也是经过了选择的，删除了对周扬他们批判的明显痕迹。

这样说是方便的，问题是周扬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这就涉及必须来讨论解放之后关于三十年代评价的整个历史了。

②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关系：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份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的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期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

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新的‘左’倾路线。”

正是这样，这个《决议》是把情绪、思想、倾向与路线区别开来对待的。同样，它自觉地区别立场问题与认识问题：“思想意识”与“思想方法”。对于一种错误，应该警惕不要混同了它是立场的错误呢，还是认识的错误呢？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与苏联不同的地方。

(二)

首先，简单地来回顾一下这次争论的必要的经过。

自“九一八”开始，日本正式强化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方面的抵抗运动也高涨起来。这个过程，这里就不再说。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界的抗日气氛也高涨起来了。三五年末，出现了“民族自卫的文学”、“民族的革命文学运动”、“国防文学”等口号。其中，“国防文学”逐渐占据了中心的地位。最早发表的反对“国防文学”的论文，是三六年二月徐行的《评国防文学》。在这之前，提倡或支持把“国防文学”作为中心口号的有萌华、叔子、立波、何家槐、王梦野、张尚斌。徐行的观点，从以后来看，他是否定统一战线本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从四月到六月，他受到很多论述者的批判。徐行最后写了《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四月执笔）就沉默了。代之而起提出新问题的，则是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文学丛报》一卷三期）。“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就是在这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来的。而胡风的这个口号，则是根据曾与茅盾商量过的鲁迅的意思而提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冯雪峰也是参加了的。这一年四月，冯雪峰带着刚刚结束长征的党中央的新方针，以及上海的党员文学家集团取得联系的任务，从瓦窑堡秘密地来到了上海。然而，胡风在上面的文章里，一句也不提统一战线，也没有阐明与“国防文学”口号之间的关系——当时，通过对徐行的反批判，这个口号的地位已经日益巩固。所以，胡风提出与“国防文学”相对立的口号，被当成是“标新立异”。这里，更为深刻的原因，可能还纠缠着胡风与周扬等人早就存在的对立。另一方面，这一年春天，左翼作家联盟自发地解散了^①。这是周扬等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文学家集团所采取的一个主动行动。他们的意图就是要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便把原来在左联以外的作家，以及与左联对立的作家包括进来。三六年六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并发表了由郭沫若、茅盾、艾思奇、朱自清等一百十一人署名的《宣言》，算是实现了这个意图。然而，七月一日，出现了由鲁迅等七十八人署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因为其中有六十五人没有参加“文艺家协会”，所以，很多人认为，它似乎是一个与“文艺家协会”相对立的组织。争论从表面看来，变成了两个口号、两个组织的对立。这场争论在一段时间内，曾经出现过纠缠琐碎的问题而有陷入空泛议论的倾向。应该说是鲁迅、茅盾、郭沫若他们把这种局面引上了正轨。他们的态度及其所起的作用，将在后面再说。总

之，争论逐步趋向结束，陈伯达的《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以结论的形式大体结束了这场争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弄清楚是刘少奇化名莫文华写的《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作家》二卷一号），可以说是这场已经结束了的争论的总结。

原注：

① 我写“左联自发的解散”，就是说，它不是由国民党方面解散的，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这个问题是应该重视的。

（三）

下面准备探讨一下争论的主要问题和重要人物的观点。

“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

据我现在所知，在使用“国防文学”这个词的文章中，最早的是上面提到的立波的《关于国防文学》。该文开头说：“一年多前，有人在《火炬》上论及国防文学，然而，接受反应到现在还是沉默。”《火炬》是上海《大晚报》的副刊。《大晚报》是“1932年2月在上海创刊的一种反动晚报，起初是研究系的报纸，后来为孔祥熙收买”（《鲁迅全集》卷五“不通两种”注三）。

何家槐在《救亡运动中作家的任务》一文中也说：“最近，在《每周文学》上又重提了国防文学的号召，这

是极有意义的。”（《每周文学》十七号）

很显然，他指的就是上面周立波的论文。《每周文学》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在这些文章发表前不久，鲁迅也在三五年十二月七日的该报上发表了《杂谈小品文》。

徐懋庸也在《理论以外的事实——致耳耶先生的公开信》（《光明》第四号）中，针对耳耶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在华北问题发生以后提出来的”这一说法，作过这样的回答：

“单说这口号的产生，那么并不是‘华北问题发生以后’的事情，在这两年以前，进步的刊物上就有人立过这名目，不过在当时，却并没有得到巨大的反应（这当然是由于现实形势之故），等到‘华北问题发生以后’，进步刊物上所提出的抗日救国文学的口号，本来有两个。一个是‘民族自卫文学’，一个是‘国防文学’。但当统一战线一组织，救亡运动一开展，‘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就和‘国防音乐’、‘国防戏剧’、‘国防电影’……一样，成为文艺界的中心口号。”

不清楚徐懋庸所说的“有人”，和周立波所说的“有人”是否指的是同一个人。但是，从这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在三三、三四年前后，“国防文学”这个词已经开始出现，自三五年末“华北问题发生以后”，则很快地被推广了。“民族自卫文学”统一于“国防文学”的过程，从胡洛《国防文学的建立》一文开头的叙述中可以窥见其一端，这篇文章是受了王梦野的《民族自卫运动与民族自卫文学》的影响的，登载在《客观》杂志二号的最后。它

说：

“我们听说的‘国防文学’，实在就是民族的自卫文学，正如我们需要民族的自卫战争一样，我们也需要民族的自卫文学——国防文学。”

一般推测，“国防文学”的口号来源于《八一宣言》中所谓“国防政府的口号适用于文学。”我并不打算反对这种看法，然而，系统地读一读这次争论的文章，令人感到从与国防政府的关系来论述这个口号的，在争论的前一阶段并不太引人注目。到了七月以后，才逐渐多起来。至于这个事实究竟包含有什么意义，也许我读的文章有遗漏，但我姑且把它们抄录下来，原封不动地加以保留。

总之，“民族自卫文学”也好，“国防文学”也好，都不是在《八一宣言》或《王明报告》之后从它们中“流出来”而变成的文学界的问题。中国的文学家们面对日益加强的日本的侵略所产生的危机感，才是产生这些口号的最根本的根源。《八一宣言》和《王明报告》不过是给他们赋予了形式和指出了方向。这本来不过是对一种方针政策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无需说明的极其普通的理解。尽管不能无视它给予何种形式、指出什么方向所具有的意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由可能给予什么形式本身与接受这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因为在论述与《八一宣言》的关系时，如果抽掉这种关系，那就会陷入一切斗争和运动都是由于共产党的方针、号召而开始的这种思想方法，或者作为其反证。

话再说回来，周立波至少可以被认为是上述最早提倡“国防文学”的人之一。让我们稍微再看一看他的论点。据

他说：“国防文学”（Th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Defence）本来是由苏联提倡的。据周立波在后来的一篇论文《非常时期的文学研究纲领》（《读书生活》三卷七期）中说，在苏联提倡这一口号的是“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简称洛卡夫）。然而，把这个口号移植到中国来，并不是一种不加任何考虑的承袭，而是有着客观形势要求的。他在另一篇文章《关于“国防文学”》中说：“除了少数或明或暗的汉奸，谁不想保卫我们可爱的中国？它与苏联的国防文学具有不同的任务。在苏联，它是保卫工农的伟大建设；在中国，它是解放民族的特殊武器。在苏联，它主要是对国外的敌人；在中国，在反对国外敌人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进攻国内的汉奸卖国贼。中国的国防文学，是在反帝反汉奸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中自觉的武装。”

周立波在《非常时期的文学研究纲领》中又说：“在这些任务之下，‘国防文学’可以找到最繁多的题材和主题。在目前的中国，‘国防文学’的题材和主题，‘触目皆是’”。

看周立波的情况，他似乎很熟悉俄国文学，从苏联找到了“国防文学”名称的先例，这是事实。然而，不能以此为理由，简单地断定他们是要把苏联的例子轻易地搬到情况不同的中国来。这从他们的论述中看，也是很明显的吧！他们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甚浅，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的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与中国新文学史、尤其是与左联运动的关系来看“国防文学”的地位。他在《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光明》创刊号）中，用“一九三〇年成立的进步的文学团体”的说法谈到左联，

引用了它的“理论纲领”的如下部分：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怒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勤劳者在这黑暗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的、反资产者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有产者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勤劳者艺术的生产。”

接着他说，从京汉铁路罢工开始，经过“五卅”事件，中国勤劳者具有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运动领导者觉悟。”他们在文学领域里也要求有自己的文学。应该从这方面去寻找产生这个纲领的历史背景。他们不满意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文学，也不满意虽然关心祖国与人民的灾难，却又抵不住周围的黑暗而陷入颓废、虚无的创造社，同时，也不满意把同情被压迫者的“人的文学”作为口号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因而，“那样简朴地规定了以勤劳者在现社会所感觉的‘感情’为文学的内容”。

周立波在作了以上的叙述之后，对这个纲领又作了如下的批判。

“这个规定，无疑的是过于狭隘。他们不但没有估量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和许多杂阶层，是他们自身解放事业的参与者。因此，这些社会成份的思想、情绪和意志，也应当被规定为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们更不懂得，对于现实抱着分析与研究态度，‘只问病源，不问药方’的旧自然主义作家，只要他们真正没有主观理想化的倾向，那么，就令他们不是站在勤劳大众的立场上，他们

的艺术也还是有社会价值的，也还是对于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有所帮助的。”

周立波还说：“一九三〇年以后的新兴文学运动，大体是依照了这个纲领而进展的。”因而，他的这个批判乃至自我批判，显然是就整个左联运动而说的。接着，他举出三〇年前后的钱杏邨作为这个纲领实践者的典型例子，指出他在活动初期，的确有一种真正新兴者的精力，然而另一方面，又带有见解的偏狭性，对鲁迅、茅盾作过低的评价，至于在他之后的蒋光慈、丁玲和洪灵菲等人，则认为他们的革命的人格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批判了他们的主观性、空想性。周立波说，在另一方面，“提到这个时期以后的文学的时候，使人最不能忘记的，要算鲁迅这时期中的杂感，和茅盾的小说，这都是新兴文学的影响力最大的成就。”

他还说，如同列宁关于政治运动所说的那样，非常事变使现实运动在一瞬间的发展，能获得上平时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成就。以此来观察文学的话，“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后的事态，给予文学以飞跃的时期。去年华北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政治出现了基本的变化，中国从半殖民地将要下降为某一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完全殖民地地位。这种民族战争的新形势与在这种形势下民族意识的高涨，便是中国新兴文学在现阶段发展的现实的各种条件。

所以，他的结论是“在这种现实条件之下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形态，就是国防文学的形态。”

以上粗略地谈了谈周立波给予“国防文学”的位置。“国防文学”派（假定可以这样说）的一分子周立波，按

照他的观点总结了左联运动是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对于鲁迅、茅盾的评价等更是应该铭记的。另外，他在新的民族抵抗的高潮中，企图寻求发展文学运动的动力的志向，应该说说是真诚的，是和那些单纯想把已有的文学家大批拉进战线里来是不一样的。

以徐行为代表的“国防文学”否定论

正当“国防文学”在逐步获得反响和扩大影响的时候，出现了徐行的“国防文学”否定论。

徐行认为，在中国，对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是重要的敌人，他们没有可能与无产阶级一起反帝。他的论述，归根到底是从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统一战线本身。

他在《评“国防文学”》中说：

“在工业较有发展的殖民地国家内，从来就不能有一个全民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战线……这个真理就痛击‘帝国主义并不满足于中国民族工业买办性’的论调，同时也痛击着‘国防文学’又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的根据”。

“既无‘中国各阶层的民众中，都有反帝的要素’那回事，更不能有‘全中国民族的文学——国防文学’”。

“我们决不幻想‘阶层的目前利益和全中国民族目前的利益恰恰是一致的’，也不幻想‘全中国民族的文学’。我们只知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阶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只有他们是先锋，也只有站在这观点上的文学才是挽救中国的文学。”

有人批判他这是“机械的”理解，而他则引用《法兰

西内战》中的一段话：“阶级的统治不能用民族的外衣来掩蔽，民族政府反对新兴阶级都是一样的。”他认为这段话就是他的理论根据。他在《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中也是反复强调这一点，说提倡“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掉进了“帝国主义的污池”。

他进而说：“我们现在是在要求思想解放的时代，要解放就要有一种最先进的思想，只有它是指南针，是灯塔，是路标，凡是要求解放的人们只有拿它作武器，它应该是战斗的，是比其他思想更优秀更完善。这就是新兴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用这种理论所领导的文学，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徐行的第一篇论文是批判张尚斌的论文的。在张的论文中曾批判主张“国防文学”的人们的内部，也有过高评价民族资产阶级反帝的可能性的。所以，诱发徐行进行批判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他的论述，只是根据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而简单地地下结论，并且完全否定了统一战线。所以，他几乎遭到了集中的批判，包括批判他是托洛茨基主义，应当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徐行的经历，在这之前及以后一切都不明，所以，关于他的论述的性质，很难下最后的结论。总之，他后来就沉默了。

胡风的论文与艾思奇的批判

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因在河出书房版《现代中国文学》第十二册中已全文译出，所以不再详

细地讲了，这里仅举其要点：

一、“五四”以后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其中一直贯穿着反帝的要求。

二、“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深化，历史达到了新的阶段。适应这个新阶段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然而并没有消除这种纠纷（不用说，使用“社会纠纷”这个词是代替“阶级斗争”这个词的）。一切“社会纠纷”都包含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题之中。

除了刚才在概括叙述“经过”的地方谈过的问题之外，胡风对这个口号的理解，在若干问题上，与鲁迅是不同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这里，让我们看一看一个值得注意的人——艾思奇的论旨。

艾思奇从以下的观点说起：文学之所以可能担负起时代的任务，是因为它反映现实；正确的反映会指出现实运动的前途，所以同时也会成为一种指示。因而，文学的生命就在于现实主义。这个观点初看起来象是否定现实主义以外的文学的，实际上，他之所以从现实主义的意义说起，毋宁说是为了强调作品如果是优秀的话，那就会超越作者的世界观所带来的歪曲，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现实。因而，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即使他的世界观是落后的，但在目前新的形势和提出新的任务的情况下，他也可能成为这个任务的部分承担者。

这显然是应用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观点。艾思奇由此

而指出：“前进的文学界”常常有关门主义的倾向，他们“常常带着前进者的骄傲，把自己当做唯一的发掘现实的工作者，而忘记了在文学战线上还有其他可以携手的友人。”但是，仅仅依靠一部分“最前进的”作家，是不可能把现实的真实性吸尽的。虽然不能说一切作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但至少可以使大多数作家成为合作者，这是没有疑问的。应该号召他们，鼓励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反映现实。

艾思奇强调现实主义，是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作家之外的作家也可能反映民族危机的现实，要尽量吸取这方面的可能性。

关于两个口号，他说：“我的意见，是赞同国防文学这一方面的。”接着，他再一次原则地阐述了新形势的特点和统一战线。根据他的说法，现在民族危机深化，不单是殖民地化量的深化，而且产生了不同的质，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战线不单是统一过去的一切的社会纠纷，而且要改变解决它的方法，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说是理解了新形势。他说：

“为什么在这新形势之下，在文学领域里我们要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呢？因为这口号是文学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可以号召广大的作者来尽他们的时代任务，而不把这个任务局限于一部分前进者的圈子里。”

“为什么我们要赞同‘国防文学’这口号，而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恰当？因为这一口号用在现阶段里太狭隘了。”

胡风把着眼点完全放在“劳苦大众”上，他看不到在